

多元文化與公共廣電機構：澳大利亞的實踐經驗

王菲菲*

《摘要》

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廣電組織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SBS) 的出現，與澳大利亞人口政策的變動息息相關。SBS 的發展運作過程，正是經由廣電機構不斷定義「澳大利亞多元文化」(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的過程。本文從孕育澳大利亞族群傳播的政策環境談起，再導入 SBS 發展歷程，討論 SBS 如何在有限的財務支援、激烈競爭的廣電環境下生存，並提供澳大利亞觀眾創新多元的服務。除了是廣電機構、多元文化旗艦機構之外，SBS 也已成爲澳大利亞文化政策與廣電政策的接榫，電視部的 SBS Independent (SBSi) 今日已是澳大利亞獨立製片影視產製的重要經費補助單位，並據有策略位置。一片榮景之中，SBS 的經營運作有其隱憂：多元文化的定義如何妥善掌握，對此概念的實踐過程中，族群團體遊說，原住民的參與程度，都對 SBS 的多元文化定義有所影響。

關鍵詞：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族群、公共廣電機構、原住民

*公共電視台研究員。E-mail: rnd50520@mail.pts.org.tw

壹、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公廣機構 SBS

對於少數族群（弱勢族群）之媒體服務，向來被視為公共廣電服務（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的核心理念之一。然此項理念之具體落實及發展，有明顯的在地特徵。1970 年代，澳大利亞由於政策轉變，人口結構在族群組成上出現明顯變動，也因此出現了族群傳播的需求。面對大量非英語背景的移民，如何讓他們融入澳大利亞生活，並逐漸產生對澳大利亞的認同感，是相當迫切的議題。澳大利亞當局的解決之道，不在既有廣電架構之內，而是另設廣播服務，1975 年在兩個城市出現了兩家社區電台型態的多語言廣播服務，1980 年起電視服務加入，此廣電服務即是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簡稱 SBS）。SBS 專屬法案及公共廣電憲章在 1991 年通過，從此正式成為「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 ABC）之外的另一公共廣電機構；澳大利亞的公共廣電服務制度，也以此雙元公廣機構的設計，服務其公民社會。

2004 年 6 月時澳大利亞人口共 2010 萬；而依據 2001 年人口普查統計資料顯示，海外出生者佔普查人口（1880 萬）的 23.1%。在家使用英語以外語言的人口佔 15.6%（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5: 4）⁽¹⁾。為此類觀眾提供廣電服務成本較高，對一般商營媒體來說誘因不大，非營利公共服務較有可能（O'Regan & Cunningham, 2000: 206）。然而這群人口，向來為 SBS 的主要關注對象，SBS 的發展，雖對族群人口有特別考量，卻不以此為限。人口流動所帶來的文化混雜、交換、互動、創生等種種可能，已將澳大利亞社會刻畫出多元文化的面貌；澳大利亞多元文化之於整體社會的意義何在，以及媒體對此探索的責任所在，皆是 SBS 所關注的。事實上，SBS 是澳大利亞政府在多元文化上最龐大的政府支出（Johns, 1991: 17）。在 SBS 的發展過程中，也可看出其重心

由「族群」往「多元文化」移動的走向。

除了不斷探索、定義、與再現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之外，SBS 作為一個廣播機構的表現，在澳大利亞媒體地景中也相當突出。在經費規模有限，服務規模無法與商營媒體及 ABC 競爭下，SBS 尋求低成本的創新經營方式建立利基，在澳大利亞媒體環境中掙得了一席之地。SBS 目前提供廣播、電視及網路新媒體服務，以 68 種語言發音的廣播節目，在調幅、調頻及線上播出。一個類比電視頻道服務，設有五項數位服務，包括一個主頻道、一個世界新聞頻道、一個電子節目表單及資訊服務的 SBS Essential，及兩個數位廣播頻道。廣播部份的聽眾設定，為超過 270 萬在家中說英語以外語言的澳大利亞人。電視部份，在澳大利亞無線電視收視環境中，穩定佔有 5% 的收視眾 (AFC, 2004: 51)。在經費方面，以政府經費為主，但容許一小時以 5 分鐘為限、不打斷節目的廣告播放。2004 年，SBS 總收入為 1.88 億澳幣（約 36.29 億台幣），其中政府經費佔總預算的 77.5%（約 28.1 億台幣），廣告及商業收入為 18.1%（約 6.57 億台幣）。有專屬法案，以政府任命成立的九人董事會負責經營運作，員工將近 900 人 (SBS, 2004)。

貳、孕育「族群傳播」出現之政策環境

對於今日的澳大利亞來說，白澳政策似乎是一個遙遠的歷史記憶；但從官方政策發展來看，偏好特定移民的白澳政策，被多元文化所取代不過是相當近期（1970 年代）的事。換言之，澳大利亞在這種人口政策轉向——從「同化」轉為「多元文化」——的政策環境中，創造了多元文化廣播機構 SBS。

澳大利亞 1901 年的移民法，以白澳政策為主軸。此種移民政策偏好英裔移民，並且期待新移民能在短時間內與澳大利亞社會同化，毋需面對適應問題。1940 年代中期，移民政策面臨第一次挑戰：二次大戰

期間，澳大利亞人口生產力降低，此成爲國家發展隱憂，當時澳大利亞官方決定以每年 7 萬名移民來因應此問題。當澳大利亞政府發現，英國移民的數量無法滿足其需求時，澳大利亞開始與歐洲國家簽定移民協議。自 1947 到 1972 年，義大利、德國、南斯拉夫、斯堪地那維亞國家、西班牙、希臘、匈牙利、捷克等歐洲國家，有 240 萬人口移入澳大利亞 (DIMA, 2001; Price, 1979: 202-203)。此種人口移動，逐漸改變了原來以英裔爲主的澳大利亞人口結構，一個新澳大利亞逐漸形成當中

然而，當時的移民政策，仍對非歐裔人口有所限制，僅允許暫時居留；要等到 1966 年的自由黨與國家黨聯盟政府宣布，准許「傑出非歐人士」移民澳大利亞 (DIMA, 2001)，白澳政策才算正式爲官方所放棄。當時的國際潮流已標示出一種反對種族歧視的人口政策走向，加拿大、美國、紐西蘭等國已有相關動作，然而澳大利亞的改變無法一夕蹴成。過往政策中，針對非政府偏好的移民，所設諸多工作限制，直到 60 年代和 70 年代才逐步撤銷 (Wilton and Bosworth, 1984: 31-37)。1972 年，工黨 Whitlam 政府標舉「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爲人口政策，相關政策由此開展。其後，自由黨 Fraser 政府對族群事務著力更深：1970 年代大量接受中南半島難民，不僅被視爲重要人道之舉，也爲當代澳大利亞注入了亞洲面貌 (Price, 1979: 205-212)。

人口政策轉向，在政治修辭上的變化最爲明顯。白澳政策當時，下議院國會議員的發言曾說出「二王不抵一白」(two wongs don't make a white)。所謂的「同化」，也被詮釋爲「長相跟我們很不像、說話想法與我們很不同調的移民，我們不要。其實……我們要的是跟我們很像，或說很快就會變得跟我們一樣的人」(Harris, 1947: 137)。1972 年，當多元文化成爲官方政策時，Whitlam 總理的辭令已與過往全然不同：「我們不希望移民覺得自己得把過去擦得一乾二淨，完全模仿、適應今日澳大利亞人的生活。我們希望看到這個社會因爲各式文化滋養而豐富，這得靠移民們維持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Bowen, 1977: 50-51)。

「多元文化」一詞在 1972 年開始進入政策場域，但直到 1979 年政

府才設有相關組織，1987年時，多元文化事務進入內閣層次，就在此種政治氣氛之下，政府開始認真考慮，在傳播部門提供族群媒體 (ethnic media) 的服務。

本文從孕育澳大利亞族群傳播的政策環境談起，再導入 SBS 發展歷程，將討論 SBS 如何在有限的財務支援下，在激烈競爭的廣電環境下生存，並提供澳大利亞觀眾創新多元的服務。除了是廣電機構、多元文化旗艦機構之外，SBS 也已成爲澳大利亞文化政策與廣電政策的接棒，電視部的 SBS Independent (簡稱 SBSi) 今日已是澳大利亞獨立製片影視產製的重要經費補助單位及策略位置。一片榮景之中，SBS 的經營運作有其隱憂：如何妥善掌握多元文化的定義？探索過程中，族群團體的政治影響，原住民的態度，都會對 SBS 的多元文化定義及實踐有所影響。

參、SBS 的發展歷程：從「族群廣播電台」到「多元文化公共廣播機構」

對引進族群媒體概念的 Whitlam 政府來說，族群媒體之爲用，是在於向非英語背景 (non-English speaking backgrounds, 簡稱 NESB) 移民以其母語宣導澳大利亞政府政策。1975 年，位於雪梨及墨爾本的兩個廣播電台 (2EA 與 3EA)，其廣播執照被指定爲族群人口使用。這兩個廣播電台接受政府經費支援，日常運作由義工操作。廣播服務推出後迴響熱烈，在非英語背景的人口中大受歡迎。1977 年，Fraser 政府計畫對族群廣播服務提供更多支持；除了要求成立全國層級與各省層級的族群廣播諮詢委員會，還準備修改當時的「廣播電視法」(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Act) 以納入相關族群廣播的規定。這個政府向各級族群團體諮詢的過程，將原本在各族群團體之間的資源爭奪、意見紛歧，延伸到廣播場域 (Jakubowicz and Newell, 1995: 131-133)。1978 年，SBS 成立

，此階段的 SBS，僅只於提供移民多語言廣播服務而已。

SBS 族群廣播服務同步發展的是「族群電視」概念。這是 Fraser 政府的競選承諾，當選便付諸實行。族群電視服務首先在 1978 年成爲正式政策。次年，族群電視審查會（Ethnic Television Review Panel，簡稱 ETRP）創立，其任務在於籌設永久性的族群電視服務。1978 年到 1980 年，此組織的可能工作內容、設計安排，各種想法紛紛出現，ETRP 也在這段期間積極地釋出了三份報告，其內容皆與設立所謂的「獨立多元文化廣播公司（Independent and Multicultur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 IMBC）」有關。計畫中預定，這個機構的宗旨是：「要以族群語言及英語來播放多元文化節目，要能吸引、娛樂、教育族群社區與社會大眾之外，還能鼓勵對澳大利亞文化多元發展及欣賞」。爲達此目標，ETPR 建議：(1)該項服務應是對既有廣電服務——包括三家商業電視網及公共廣電機構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在文化與語言觀點上所進行的補充性服務；(2)此服務的主要對象是族群社區，並且；(3)該服務也要能讓社會大眾近用(access)。在經費結構上，ETRP 建議以廣告與政府經費的組合型態。節目來源組合上，ETRP 建議本土製作可佔 25%，其餘 75%採用進口內容。針對來自海外的非英語節目，英文字幕將搭配播出 (ETRP, 1980)。

1980 年 ETRP 完成最終報告，IMBC 法案草案送進國會上議院，SBS 多元文化電視服務，開始在澳大利亞東岸兩城市試播——在雪梨以 VHF0 號頻道，在墨爾本以 UHF28 號頻道播出。然而，IMBC 法案未過關，國會拒絕 IMBC 的概念。阻力來自四方面：首先，由於 IMBC 草案中經費結構設計允許廣告，既有的商業電視產業擔心新成立的 IMBC 分食廣告大餅，因此阻攔。其次，當時自由黨的後座國會議員擔心，IMBC 這樣一個新設組織，將會如既有的公共廣電組織 ABC 一樣，佔據龐大政府資源。其三，反對黨工黨擔心，IMBC 的設計，會導致「頻道族群特區」(electronic ghettos)的出現，也就是多元文化的族群內容，就只出現在其專屬的電視頻道裡，難與主流內容交流，反而在頻

道與內容上，造成某種族裔隔離的現象，因而對移民融入主流社會產生干擾 (Patterson, 1992: 45)。阻力之四，來自澳大利亞本地影像產製工業。澳大利亞在電視政策上，向來對本土內容以產業及文化考量，執行諸多保護措施，比方對商業電視要求每年固定比例的本土內容以及特定節目類型的時數配額規定。在大環境是鼓勵本地內容的基調之下，縱使 IMBC 強調會逐步增加對本地內容的需求，草案中設計高比例的進口節目內容，著實無法讓本地產製工業放心 (O'Regan & Kolar-Panov, 1993: 131)。上述四種遊說力量，皆有重要影響，IMBC 草案的推動工作，就此打住。

多元文化電視服務的法案，擱置在國會裡，度過了 1980 年代的多數時間。不過試播中的 SBS 電視仍持續其服務，周邊討論也持續進行。多元文化電視的命運在 1980 年代，就在各式政策方向之間擺盪。當時一個重要的根本議題是，是否該為多元文化廣電服務特別設立一個廣電組織。一份 1984 年的報告 *Serving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Role of Broadcasting*，不僅在行政管理、法案、機構、節目等各方面提供廣泛具深度的政策選擇建議，包括在三年內將本地內容的比例由 25% 提升到 50%，甚至還主張應設置具有法定職權地位的廣電組織，以取代既有的 SBS 服務，認為如此才能為澳大利亞社會有效提供多元文化內容，並且才能在族群社區與主流社會之間促成文化交流，社會整體才能因此受益 (Committee of Review of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1985)。工黨政府相當歡迎這份報告，正當各界期待政府正面回應時，未料 ABC 竟成阻力。

1980 年代的澳大利亞廣電環境變動頻繁，競爭激烈。ABC 在 1983 年獲頒新法暨公共廣電憲章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ct 1983*)，原本委員會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型態的建制轉為公司型態 (corporation)，一場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進行。也因此 ABC 亟欲擴張電視服務，當時的多頻道作法，就是增加一個電視頻道，播送中的 SBS 電視因此成為目標。對當時的工黨政府來說，將 SBS

併入 ABC 顯然會省下可觀的政府支出，也因此出現態度轉變。然而，對當時 SBS 的經營團隊及族群社區來說，果若成真，將是族群媒體發展的一大挫敗。作為獨立的 SBS，族群意見可經社區諮詢管道產生影響，但這種族群自主性的權力關係設計及架構流程的安排，一旦併入 ABC，勢必讓步妥協，族群不過是眾聲中的一個身份而已，族群意見亦有可能稀釋在巨大的 ABC 組織之中。一場保衛戰因而展開，族群社區發動遊說力量，由 SBS 經營團隊運籌帷幄，最終阻止了 ABC 提議的合併案 (Jakubowicz & Newell, 1995: 135-136)。

其後的政治環境，有利多元文化傳播的機會相繼出現，也塑造了支持多元文化傳播的論述環境。傳輸與傳播部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簡稱 DOTAC) 於 1988 年釋出一份審查報告 *Review of National Broadcasting Policy*，提議透過全國廣電機構 (ABC 與 SBS) 來提供質的廣播服務，以補商業之不足。對 DOTAC 來說，SBS 應有專屬法案，主責多語言與多元文化的廣電服務 (DOTAC, 1988)。1989 年的聯邦政府文件 *National Agenda for Multicultural Australia*，再度確立此種服務的必要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1989)，SBS 被視為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文化機構。

1991 年 SBS 法案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Act* 終於通過。SBS 有了專屬公共廣電憲章，規範了 SBS 需提供多語、多元文化的廣電服務的責任，這標示了政府對 SBS 的承諾。SBS 的主要社區諮詢委員會地位重要，與董事會平行。SBS 三年發展計畫，可要求贊助，有獨立法案規範。對 SBS 不利的是時機，無法像 ABC 一樣獲得全額政府支持。

SBS 的主要功能是藉提供多語多元文化的收音機與電視服務，以告知、教育、娛樂所有的澳大利亞人，並反映出澳大利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事實。公共廣電憲章中載明 SBS 必須滿足下列事項：

一、滿足澳大利亞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傳播需求，服務對象包括族群及原住民；

二、多元文化對於澳大利亞社會發展的貢獻，需增加公眾對此之認識；

三、澳大利亞的文化、語言、族群具多樣性，需促進澳大利亞人對此事實之理解與接受；

四、致力於語言與其它文化技術的保存與持續發展；

五、在可行的範圍內，以澳大利亞人偏好使用的語言，來進行媒體告知、教育、娛樂的功能；

六、利用澳大利亞多元多樣的創意資源；

七、應對澳大利亞廣播環境的多樣性有所貢獻，並應將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與社區廣播部門的表現列入參照考量；

八、經由眾多觀點的展現，以及創新的表達方式，來擴展澳大利亞廣播服務之範圍，並展現出澳大利亞社會的變動本質。

肆、SBS 的服務表現

以下將從廣播與電視兩方面，檢視 SBS 的服務表現。

一、SBS 廣播服務

SBS 的廣播部份從 1975 年開始運作。當時在雪梨以 7 種語言，墨爾本以 8 種語言，每日播音四小時，運作全由義工負責。到了 2000 年，SBS 廣播網已經以 68 種語言播音，每週從雪梨、墨爾本兩地的調頻、調幅網播音，全澳主要城市皆可接收，播音總時數 650 小時 (SBS, 2000: 44)，目前仍維持此種規模。

SBS 廣播製播特定語言節目，依據該語言群體的人口規模、到達澳大利亞的時間長短、英語程度、55 歲以上人口比例以及受雇比例等因素做決定 (Wilson, 1996: 10)。2003 年在深入社區諮詢之後，將既存的節目分配調整，此舉爲了回應澳大利亞人口變化、配合人口普查的結

果。因應人口增加新的廣播節目（馬來語、索馬利語、阿姆哈拉語），並在特定語言上增加播出時數（印度語、粵語、普通話、菲律賓語、阿拉伯語）⁽²⁾。特定語言服務之外，針對年輕族群訴求，晚間 11 時起至翌晨 6 時，為年輕人音樂節目 *Alchemy*。

節目內容包括新聞（廣泛含括在地、全國及國際新聞）、時事、社區訊息、音樂與體育活動。多語廣播的目的特別強調要將非英語人口，融入澳大利亞社會之中，尤其要「協助移民在澳大利亞安頓下來，並提供資訊予非英語背景的人口」（SBS, 2000: 45）。1970 年代，此項功能在健保 (Medicare) 首度施行時，針對 NESB 人口產生了極大的政策說明之功能。時至今日，政策說明仍為 SBS 廣播的重要功能。2000 年澳大利亞首度實施消費稅 (GST)，對日常民生及商務造成重大影響；SBS 廣播邀集各種語言的雙語稅務人員合作，為聽眾解惑。廣播傳布資訊的便利性，也讓 SBS 得以展開與各機構合作的社區及教育計畫，多語服務也使得這些計畫得更深入社區，有更廣泛的觸達。

而 SBS 廣播的多語能力，在處理國際新聞時，有突出的表現。比如在「英阿福克蘭戰役」時，在當時一片引用英國新聞來源的澳大利亞新聞環境中，SBS 西語部門廣播記者直接從 Buenos Aires 現場播音，在其它新聞媒體普遍引用英國說法為新聞來源的情況下，為聽眾提供了一手的另類觀點 (Jakubowicz & Newell, 1995: 141)。而近期中東戰爭及之前的 Kosovo 戰爭，SBS 廣播的多語才能，亦為澳大利亞整體的新聞環境提供了不同的觀點與聲音。

SBS 廣播以族群廣播的角色起家，迄今仍肩負此種角色與目的。它的觀眾群有所限制：廣播的聽眾一定得有能掌握住該種語言，因此，族群服務的任務當然在廣播身上。然而電視由於可以加上加字幕，因而能觸及族群以外的觀眾。

二、SBS 電視服務

SBS TV 在 1980 年首先於雪梨、墨爾本出現，之後再擴張到其它

主要城市。起初每週播出 35 小時，1980 年代漸增至 55 小時。目前為每日播出 21-22 小時。

1980 年代的澳大利亞媒體地景，競爭激烈，SBS 在有限的政府經費支援和有限廣告支援下尋求利基，1990 年代時，SBS 經營者曾自陳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滿足公共廣電憲章中所賦予 SBS 的任務，還得注意廣電環境中 ABC 及其它社區廣電機構表現，再決定 SBS 要如何運作行止，這種種對 SBS 的要求在 SBS 經營者的眼中看來，實在「相當嚴苛」(Long, 1995: 18)。

正是此種經營壓力與成本意識，SBS TV 非得在澳大利亞廣電環境中以低成本創意經營不可，後來竟意外崢嶸發展。這可從以下方面來看：因應經費限制、成本考量的節目內容組合；創新節目型態；成功設定出利基節目。重要的是，這些特徵，都需要置放在當時澳大利亞的廣電環境當中，才能看出 SBS 的成就所在。

1980 年代，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SBS 電視無力與商業電視台，甚或 ABC 競爭節目來源。甚至新聞的消息來源，也必須從未獲其它媒體青睞的新聞素材中選取。然而這樣的組合反而在澳大利亞媒體環境成爲一種新鮮組合 (Patterson, 1992: 46-47)。SBS 電視就在其它電視媒體挑揀後的漏網素材中，進行重新組合包裝。

既是低成本經營，便要在創意上求突出，而 SBS 的創意多少都爲既存的澳大利亞公共廣電服務帶來新意。比方說，SBS 的多元文化視野爲反映各種國際視野，SBS TV 開闢了一個國際新聞雜誌類型的節目 *Dateline*（至今仍爲 SBS 旗艦新聞節目）；*Dateline* 頗爲成功，刺激了 ABC 設計類似的節目 *Foreign Correspondent*，而因爲當時 ABC 的經費無虞、資源豐富，因此節目相較於 SBS 有更突出的表現 (Seneviratne, 1992: 54)。

ABC 與 SBS 同被列爲澳大利亞國家的公共廣電機構，互爲競爭對手，類似情事可視爲正面競爭。近年另有一鮮明事例：SBS 與觀眾互動之節目 *Hotline*。*Hotline* 自 1990 年起開播，是澳大利亞第一個處理觀

眾意見的電視節目。至今仍維持著每週一次十分鐘的播出型態。此節目是 SBS 持續與觀眾對話的窗口。每週一次將觀眾與聽眾的褒貶意見呈現於節目中。節目設計理念是給觀眾機會發表意見，也分享其它觀眾的意見，在對話中發掘人性趣味以及澳大利亞文化的多元性。2001 年起，ABC 開闢了每週 15 分鐘的類似節目 *Backchat*，並在 2003 年另闢每集 10 分鐘的帶狀觀眾對話節目 *Feedback*。此類節目基調的流暢、幽默、型態與風格，幾乎都有 *Hotline* 的影跡。ABC 仿效之作出現之前，*Hotline* 是澳大利亞唯一此類的節目，SBS 以此自詡其重視觀眾意見的程度。其實公共廣電機構的運作，本就應容許核心產出——節目——及相關公眾活動，對公民開放，直接接受公評。尤其重要的是，在意見來往回應之間，建立起公共廣電機構為「全民共有共享」的想法，亦即具體落實「公共所有權」(the sense of public ownership)的概念。「對話」因此是公共廣電機構與觀眾溝通的重要機制。「對話」可以理解為，觀眾/公民對公共廣電機構意見的形成，以及公共廣電機構進行探知、處理、並且進行溝通的過程。觀眾意見調查、公共服務、觀眾意見處理（褒貶、抗議、申訴等）皆屬此範疇。就這點而論，SBS 在經營壓力下，反倒以低成本的方式，成功滿足公共廣電應該重視觀眾、貼近觀眾的責任。

對於節目類型選擇，初期基於成本與來源充裕與否的考量，SBS 特別注重紀錄片及電影，紀錄片持續經營成為 SBS 特色，電影則以大量外語片及舊片為主。1990 年代，SBS 電視還是低成本經營，外語電影有慰藉第一代移民鄉愁的意味，配合英文字幕之後更可跨越語言障礙，全民共賞。外語電影在午間、夜間時段頻繁出現，間或配合影評解說，或以主題影展形式播放，無形中成為澳大利亞觀眾日常生活化的電影素養教育。另外，自 1986 年起的電影介紹節目 *Movie Show*，每週三十分鐘，由同一組兩位主持人從開播至 2004 年持續主持，節目中討論院線電影、細數世界電影人物風流，甚受觀眾歡迎，成為 SBS 的旗艦節目之一。

SBS 對外語電影的長年經營，所積累下的專業經驗，就欣賞世界電影及累積電影知識來說，是觀眾之福。在經營方面，SBS TV 在外語節目上建立了壟斷地位。登上 SBS 螢幕，就是進入澳大利亞市場的跳板(O'Regan & Kolar-Panov, 1993: 159)。而早期播放外語舊片的節流手筆，今日仍受觀眾歡迎，已成另一開源之道。SBS 在 1990 年代末期進入有線付費電視市場，成功打造了「世界電影頻道」(World Movie Channel)。

另一個 SBS 在澳大利亞無線電視市場中的突出之作是世界菁英運動賽事。商業電視台與 ABC 所關注的是如板球 (cricket)、澳式橄欖球 (Aussie Football)、橄欖球聯盟 (Rugby League) 等在澳大利亞具有傳統，或已商業化發展的大眾運動賽事。SBS 當然無法在轉播權利金上與其它無線電視網競爭，因此朝其它未受青睞的國際菁英賽事發展，如足球 (soccer) 選擇「世足賽」，自行車選擇「環法自行車大賽」(Tour de France)，另外還有世界田徑賽、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等。就媒體經營來說，SBS 再度掌握到值得經營的利基。而 SBS 所進行的創新實驗，商業電視留意其發展，諸如一級方程式賽車賽事，在 SBS 成功之後，轉播權後來為商業台買走。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SBS 另闢蹊徑，為澳大利亞觀眾拓展了運動節目的品味，提供了更多選擇。SBS 在體育節目專業上的發展，也使其發展出澳大利亞第一個專業新聞節目。

最後，SBS TV 的晨間時段，長期以來是各國新聞時間。播放以衛星傳送、不附英文字幕的當日新聞。由於新聞來源單位同為公視，節目或是免費、或有折扣，再加上無需處理翻譯的後製工作，因此亦為 SBS 的節流之作。從 1990 年首播俄語新聞，1993 年 8 月 WorldWatch 開始播中法德俄的節目 (SBS, 2003a)。目前晨間時段名為 SBS WorldWatch Program，有 18 個國家、以 17 種語言播放的 21 個新聞節目，大多數節目都是來自公共廣播機構。節目內容除了新聞之外還有其它訊息與議題的討論。國家包括中國、智利、法國、德國、希臘、香港、匈牙利、印尼、日本、義大利、馬爾他、菲律賓、波蘭、俄羅斯、西班牙、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與美國。

在 SBS 出現之前，澳大利亞一般觀眾並不習慣英文字幕，即使到今日，佔了約 80% 澳大利亞無線電視觀眾的商業電視台，附字幕的電視節目仍相當少見，相較之下，佔有率達 15% 的 ABC 節目提供較多字幕，但數量仍無法與 SBS 並論⁽³⁾。

從觀眾使用規模及 SBS 的營收成長，可以看出澳大利亞觀眾對 SBS 的接受程度。近兩年，SBS 電視使用了超過 400 個來自世界各地的節目，語言超過 60 種，半數以上節目使用非英語播出。就觀眾而言，每週有超過 800 萬人收看，58% 澳大利亞的家庭每週均會使用 SBS (SBS, 2003a)。

就字幕所牽引出的文化效果而言，SBS 已成功將其原本「族群傳播媒體」的定位，轉化為「多元文化傳播媒體」，並非僅為少數族群服務，而是服務澳大利亞社會的多元文化，以其節目內容反映觀照其人口多元文化的特色與觀點，並更進一步開拓澳大利亞觀眾的文化視野與胸襟。

近年來，SBS 觀眾的使用規模不斷成長，廣告業績也蒸蒸日上。在 2002-2003 年度，儘管澳大利亞廣告產業未見起色，SBS 廣告贊助部份就有 14% 的成長，淨值達 2,180 萬澳幣。在 2003-2004 年度，SBS 電視廣告贊助部份，較上年度成長 22.5%，淨值達 2,550 萬澳幣。而 SBS 的經費來源雖然容許廣告贊助，但需遵守詳明的廣告規範：電視廣告時間限制每小時不得超過五分鐘，且廣告只能在節目與節目之間播出，不得打斷節目。SBS 的語言服務（包括翻譯服務、字幕服務、配音服務等），亦有可觀業績，2004 年度淨值超過 120 萬澳幣。SBS 同時與書籍與影音商品銷售業者合作，積極開發推廣自有品牌，商品數量與業績皆在快速成長中 (SBS, 2003a; 2004)，這些再再顯示出 SBS 整體的經營成績。

伍、SBS 對在地文化/澳大利亞內容的貢獻：文化政策與廣電政策的接棒點 SBSi

1980 年代的 SBS TV 常被批評自製率低 (Patterson, 1992: 49)，至 1990 年代中期為止，在戲劇上一年只能產出 4 個小時而已 (Long, 1995: 19)；經費是關鍵。不過 1994 年起，轉機出現。此年，聯邦政府釋出第一份全國文化政策 *Creative Nation*，鼓勵本土影視內容產製列為文化政策目標之中。而執行方案之一，就是讓 SBS 獲得 4 年總計 1,300 萬澳幣的經費，補助優質節目產製工作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4: 46-48)。

文化政策與廣電政策在此正式接軌，並促成 SBS 電視部裡 SBSi 的出現。SBSi 是個經費補助單位，接受獨立製片拍片申請案。1998 年，聯邦政府給予 4 年 1,900 萬澳幣繼續補助 (SBS, 1998)。而從 1994 年到 2000 年，SBSi 收到的提案就有 3,700 份之多，核案後產製了超過 420 小時的節目，內容特別集中在偏遠地區的影片工作者，尤以原住民及具非英語背景者為主 (SBS, 2000: 42-44)。在第二期經費即將屆滿之前，有鑒於 SBSi 「高度成功與創新表現」，2001 年下半年，聯邦政府再給予 SBSi 較以往更高的補助經費，從 2002 至 2006 年期間，總共補助 3,340 萬澳幣 (SBS, 2002: 13)。SBSi 十年有成，自 1994 年成立已來，SBSi 作為一個品牌，旗下產品國內外獎項獲獎也超過了 450 座。已產製出超過 800 小時獨立製片的戲劇與紀錄片，其中許多作者來自 NESB 及原住民背景，SBSi 的存在，對澳大利亞獨立製片的創作人才——尤其具有特殊背景者——是一個重要的機會。打基礎、播種，就是 SBSi 持續從事的基本工作 (Long, 2001: 3)。

SBSi 自陳其價值所在，是協調聚集不同的團隊，合力實現一個企畫案。這種協調能力，有多種展現層次。首先，SBSi 鼓勵電影、戲劇、動畫、紀錄片的大膽刺激企畫。除了在企畫內容上冒險，SBSi 還在

晉用企畫案上冒險，鼓勵新人。其次，SBSi 的協調能力，不僅在聚合產製團隊，還在於與澳大利亞電影及電視產業的獨立製片部門之間，建立起合作關係。第三，在經費財政安排上，還進一步與國內與國際其它電影機構發展合作拍片的結盟合作關係。不僅在澳大利亞境內與 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 (簡稱 AFC)、Film Australia、National Indigenous Media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Centenary of Federation Fund 等機構合作，在國際間則與 BBC、Screen West、RTHK、ZDF 等國外媒體組織合作 (SBS, 2000: 42-44; SBS, 1999: 30-35; SBS, 2004: 5)。此外，SBS 也與各級政府電影發展機構進行合製，或於產製流程之不同階段進行合作；合作對象除了 Australian Film Finance Corporation (簡稱 AFFC)、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Film Australia 之外，還包括省級政府的影視經費發展協力機構，如 Film Victoria、NSW Film and Television Office、Pacific Film and Television Corporation (Queensland)、Film Tasmania、Screen West (Western Australia)、South Australian Film Corporation (SBS, 2004: 6)。SBSi 如此表現，已成爲澳大利亞影視產業中策略結盟與發展的重要樞紐。

依據 SBSi 公布的最新運作原則，接受 SBSi 補助的企畫案，需在螢幕上（內容）、螢幕下（工作成員的組成）皆符合 SBS 鼓勵多元文化的宗旨，年輕人才亦應近用培養。目前每年約 700 萬澳幣的產製基金，80% 配置在電影與戲劇（包括低預算電影）上，20% 指定使用於紀錄片；整體經費至少要有 5% 是與原住民內容有關。在這項金額之外，SBSi 與 AFFC 定有協議，每年要合作支持 9 部 1 小時長的紀錄片。所有的申請案，皆以個案方式處理，個別考慮 SBSi 的財務涉入程度。雖然 SBSi 會以投資效益來考慮是否給予經費，但對多元文化的服務仍是一項考慮重點。最後，與澳大利亞政府有合製協定的國家，SBSi 是有可能資助合製案的，但該案需符合「澳大利亞內容」的相關規定（或與澳大利亞有關的故事內容，或運用到澳大利亞的創作生產力）⁽⁴⁾。

在此以 SBSi 補助之戲劇爲例說明，2000-2001 年間製播的劇集

Going Home 接受 SBSi 補助，深受觀眾歡迎。在週一至週五晚間 7:30 到 8:00 的時段播出（下午重播），1999 年起共播出了 65 集。該劇預算雖不寬裕，但在製作與節目類型上力圖嘗試及突破：上午撰稿（編劇參酌演員及觀眾網路意見），下午錄製，晚間播出，節目內容扣合當日時事。此劇以一種不同方式，召喚較年輕的族群參與政治、關切政治、並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去定義政治，是一種嶄新的嘗試。故事在每天下班通勤火車上展開。個人生活、工作的分享討論，針貶時事與公共政策；個人與規模不等的大小社區互動，及經由互動所建構出的人際關係，都在這齣戲中一一現形。其間有公共與私人的空間建構，以及公私場域界限的流轉與變動。以戲劇的模式以及由此形式延伸的公共領域，處理的都是政治，但其與滔滔不絕的名嘴所定義的政治，極其不同。由於時效性與地域性的因素，此劇集國際出口的可能性不高，若無 SBSi 支持，此類企畫難有實現可能。

陸、榮景下的隱憂？

從義工支撐運作的兩家社區廣播電台，到今日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的廣電機構與文化機構，SBS 的成長有目共睹。然而，作為一個同時倚賴政府經費與廣告經費的公共廣電機構，SBS 的存在並非沒有危機。SBS 要不斷去掌握及詮釋「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亞社會發展下的意義，並在其經營表現上對「多元文化」不斷的定義，形成運作上相當的壓力。上述問題可由三方面來談：其一，族群服務是否能等同於多元文化服務，兩者之間若有扞格衝突，要如何平衡？其二，作為一個有營運壓力的「多元文化」「廣電機構」，在擴大觀眾基礎、期望增加營收的壓力下，是否在結構上更有可能逐漸往主流觀眾靠攏，採取一種較為安全的經營路線，而逐漸減少以實驗、挑戰的方式扮演公共廣電機構的角色，或詮釋多元文化的意義？其三，「多元文化」儼然以包容多元的姿態

出現，然而包容多元如何可能？原住民長期存在的心結如何化解？

2003年11月，越裔社區針對SBS進行公開抗議活動，為期月餘。事件導因於SBS晨間*WorldWatch*的新聞節目時段，播出由越南電視(Vietnam TV)所提供的節目「*Thoi Su* (時事)」。越裔社區抗議SBS未徵詢該社區之意見，就播出了這個由越南共產黨政府控制的電視台所產製、並免費提供給SBS播放的「政治教條宣傳節目」。由於許多越裔澳人，當年逃離越共統治時受過凌虐迫害，因此聲稱SBS播出*Thoi Su*不僅冒犯了越裔社區，還重新勾起許多人的精神創傷。越裔社區先在11月進行一次五千人的公開抗議，再在12月初於SBS雪梨總部前進行一萬多人的公開抗議。期間還大量撥打SBS總機及免付費電話，直接造成SBS在電話費損失及業務不便，並在SBS網站上回應大量訊息，此部份串連了越裔美國人的合作參與(Gipps, 2003; Ketchell, 2003)。在越裔社區成員公開抗議之後，SBS董事會召開臨時會議，接受社區諮詢委員會(Community Advisory Committee)建議，認定*Thoi Su*的播出決策過程有瑕疵，除了對越裔社區表達歉意之外，*Thoi Su*則直接撤播。董事會並保證，日後要播放類似節目之前，必定徵詢越裔社區意見(SBS, 2003b)。

*Thoi Su*事件雖然以政治落幕，突顯的其實是SBS根本的認同問題：SBS作為一多元文化廣電機構，為族群社區的服務究竟要到何種程度？其族群服務與多元文化服務之間界線要如何劃分？對多元文化的定義，以及由多元文化廣電機構的專業自主作詮釋，如果出現衝突及歧義，應該如何解決？

首先，對於澳大利亞境內某些通越語、並支持*Thoi Su*的非越裔觀眾來說，該節目是澳大利亞境內難得出現的越語時事節目；相較於澳大利亞境內由越裔社區主持，以反河內為基調的越語媒體，報導當今越南時事的*Thoi Su*，有其清新之處，更何況政治內容所佔不多，觀眾亦可以有自主判斷，所謂政治宣傳之說難以成立。對這些支持者來說，當澳越關係要開始正常化時，難道不該對越南現況進行瞭解？其次，越裔社

區直接對 SBS 施壓而撤下節目，雖然 SBS 在行政程序上落人口實，但在越裔社區介入之下改變節目安排，SBS 的新聞自由及專業自主，不啻遭受極大折損。其三，越裔社區為求抗議訴求成功，集結各方媒體勢力，不論其立場，甚至將平日對公共廣電機構、多元文化、原住民議題持有批評偏見立場的廣播即應主持名嘴，都拉攏至與 SBS 對立的立場。這種飲鴆止渴的作法，引起極高爭議。而越裔社區明明與越南有相當密切、實質的互動往來，卻要在形式上反對一個越南電視節目，當 SBS 撤下 *Thoi Su* 之後，竟建議播出由美國越裔社區製播的反河內立場節目，種種作法，再再引起爭議。這也就是 SBS 總經理 Nigel Milan 在上議院參加為此事所辦的聽證會時，表示越裔社區內部早將異議聲音排出，此次越裔社區抗議並不具有實質代表性 (Ketchell, 2003)。

越裔社區抗議活動，其背後的策略運作或許另有實情，但抗議成功為不爭事實。此舉或為其他族群社區立下範例，然而，類似的爭議，只會折損 SBS 的信譽與代表性。事實上，當年促成 SBS 法案通過影響甚深的族群社區聯盟 (Federat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Councils of Australia, 簡稱 FECCA) 已對 SBS 公開表達不信任的態度。其主席抱怨，SBS 的表現已越來越遠離族群社區的需求，連族群社區舉辦的慶典活動，SBS 也少來參與。FECCA 主席公開指稱，SBS 偏好的服務對象，是那些高教育水準，「喝卡布基諾 (cappuccino drinkers)」的中產階級。FECCA 曾總結所有意見，致書面意見予 SBS 表示其對以下事件關切：外語節目減少、董事會組成並未反映其所代表的族群社區、播出獨裁政權國家掌控之媒體所產製的節目、並且缺乏與族群社區的聯繫。FECCA 內部甚至出現 SBS 替代方案，打算向聯邦政府申請更多預算，在廣電管制者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 簡稱 ABA) 釋出更多社區廣播電視執照時，將資源移轉至社區型的族群媒體；而此部份的經費運用，極可能對 SBS 的政府經費來源產生排擠效果 (Kremmer, 2003)。

在 FECCA 公開表明意見之後，當年大力促成 SBS 成立的前首相

Fraser，亦公開表達相反意見：族群社區需考慮到其言論的政治後果，例如對公共廣電制度及 SBS 不友善的政府（意指自 1996 年執政至今的執政聯盟），可能以改革 SBS 為名將其裁撤或併入 ABC。Fraser 並且嚴正警告，SBS 的存在不只是為族群社區而已，SBS 的多元文化意義，是在「服務所有的澳大利亞人」(Kremmer, 2003)。在政府之外，對於 SBS 多元文化廣電機構責任的認定，這是一次最為尖銳的意見對立與交鋒，近年來少見。

Thoi Su 事件落幕未久，2004 年 4 月 SBS 旗艦節目 *Movie Show* 兩位主持人 Margaret Pomeranz 與 David Stratton 聯手請辭，稍後證實兩人轉投 ABC 主持新聞之電影節目。在一份公開聲明中，Pomeranz 表示，作為 SBS 理念的熱情支持者，她無法接受現有領導團隊所帶領的新方向 (Maddox, 2004)，輿論形容兩人離開 SBS 的那一刻，標示了 SBS 某個時代的結束 (Enker, 2004)。

但新時代有如何的樣貌與願景？SBS 的節目表有相當的變動，節目的撤換並非因為收視率不佳，而是觀眾訴求策略的改變，目的在於吸引主流觀眾與年輕觀眾 (Kalina, 2004; Enker, 2004)。比方說，SBSi 的製播計畫頗引爭議：*Desperately Seeking Sheila* 探討偏遠地區男子難覓伴侶的徵婚議題；*The Colony* 設計兩百年前墾殖期的時空，讓一群當代的澳大利亞人重新體會祖先生活的點滴。這些企畫都有真人實境節目 (reality TV) 的意味，某些觀察家批評為「向下沉淪越來越笨 (dumping down)」。員工批評這一波改革：保守、市場導向 (Enker, 2003, 2004)。SBS 的變動，不只出現在節目表、高層主管異動，還在收視率表現上。澳大利亞金融時報便指出在電視產業中，SBS 是 2004 年度失去最多觀眾的電視台，觀眾較前一年少了 6% (Shoebridge, 2004)。

面對批評，SBS 電視部負責人 Shaun Brown 表示，他所領導的方向，是全世界公視包括英國 BBC、愛爾蘭 RTE、加拿大 CBC 都在走的方向：也就是回應觀眾需求，向觀眾負責 (Enker, 2003)。Brown 非常實際地拿「回歸至公共廣電憲章」作為 SBS 電視的行動準則。不過，他的

批評者 Pomeranz，曾在強調外語電影與字幕的重要性時，闡釋 SBS 的意義，她認為 SBS 在做的就是「將世界拉得跟澳大利亞近一點」：這些電影反映了即使有人種的不同，人性是相同的；不同種族的人也關心孩子，也會墜入愛河。如此一來，「澳大利亞人對於與自己截然不同的文化，比較不那麼害怕」。但對 Brown 來說，「將世界拉得跟澳大利亞近一點」根本沒有列載在 SBS 的公共廣播憲章中。憲章中標舉的責任反而是鼓勵澳大利亞內容，讓 SBS 為更多澳大利亞人近用。他認為 2004 年在 SBS 的歷史上，第一次在每週節目表中，出現了兩個以澳大利亞紀錄片為主的帶狀節目 *Storyline Australia* 與 *Inside Australia*，兩者已建立起有穩定的觀眾群，加上 SBS 本土自製節目比例這兩年已有顯著增加，因此對於新的經營方向有相當的信心 (O'Regan, 2004)，這場針對 SBS 服務理念的詮釋爭議仍在進行中。

SBS 所面對的第三項根本危機，是有關原住民內容的處理問題。這個問題雖沒有特定事件的急迫性，但卻影響著「多元文化」的定義，以及「多元文化」概念與原住民的距離。

2005 年 1 月 26 日澳大利亞國慶當天，SBS 在澳大利亞人報 (The Australian) 刊登一則廣告，標題為「對 SBS 來說，每天都是澳大利亞日 (Every Day is Australia Day on SBS)」。這是一則慶祝澳大利亞文化多樣、多元的形象廣告。然若細究，此多元文化定義所慶祝的多元與包容，僅限於兩百年來的移民而已。對於澳大利亞原住民來說，將 1788 年 1 月 26 日英國將新南威爾斯州納為殖民地的日子，訂為澳大利亞國慶日，其實是一種冒犯——白人來到澳大利亞，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承受殖民統治、因歐洲人帶來病菌而大規模死亡甚至滅種等，是諸多苦難的開始。因此澳大利亞日對澳大利亞原住民來說，值得紀念，但不值得慶祝。

因此，提到 SBS 與多元文化，澳大利亞原住民或多或少都有些躊躇遲疑、愛恨交織、與複雜難解的心結。對原住民來說，他們在澳大利亞大陸上有五萬年夢土 (Dreaming) 歷史，然而澳大利亞政府對於近期

才抵澳的移民人口（尤其是 NESB）在傳播活動的贊助支援、幫助移民進入新生活、與適應社會的種種協助，都超過對原住民的幫助。比方說，政府在政令宣導上的費用預算上，規定要有 7% 使用於非英語人口的廣播與報紙，但對原民部份並無類似規定 (ATSIC, 1999: 39-40)。近期 SBS 委辦的學術研究也發現，儘管受訪的原住民焦點團體認為，多元文化是一件好事，讓澳大利亞這塊土地上出現了眾人共享、多姿多彩的文化，但這中間難免有一絲遺憾，那就是「原住民文化近幾年才受到鼓勵」(Ang et al., 2002: 20)。而 SBS 在產製原住民節目上，雖然產製相當時數的原住民內容，設有原住民媒體小組 (Indigenous Media Unit)，並且有原住民新聞報導暨節目製作需注意之規範綱領 *The Greater Perspective* (Bostock, 1990; SBS, 1997)，但相較於前述事件中，越裔社區及其他族群社區對於 SBS 的認同感、歸屬感、與擁有感 (the sense of ownership)，是原住民付之闕如的，也就是說，原住民在心理上，並不認同 SBS (ICA, 1999: 6-8)。作為「多元文化」傳播機構的 SBS，對原住民來說，較傾向新移民、忽略原住民。因此，當澳大利亞原住民呼籲成立全國原住民廣電服務 (National Indigenous Broadcasting Service，簡稱 NIBS) 時，NIBS 的想像是個與 ABC、SBS 同等級的原住民廣電服務 (ATSIC, 2000: 61; ATSIC, 2000) ——這才是層級夠高、真正為原住民所擁有的廣電組織。然而，這樣的主張，並不能否定 SBS 對於產製原住民內容的努力以及繼續努力的必要。原住民媒體內容與傳播人才，需要在各種媒體管道中出現，不應輕言放棄 SBS 這個重要管道。更何況，SBS 廣電憲章中明確指明原住民社區為 SBS 的服務對象，因此克服原住民對 SBS 的認同障礙，是 SBS 的責任。

柒、代結論：多元文化與浮生 (Floating Lives) —— SBS 的責任

原籍香港的導演羅卓瑤，入籍澳大利亞之後，在 AFFC 的經費支援下，執導了「浮生」(*Floating Life*)(1996)。這部電影在 SBS 電視播放時，引言人 Margaret Pomeranz 讚嘆其晶瑩剔透深刻動人之餘，既感動又慶幸地說，澳大利亞何其有幸，能讓這對有才華的夫婦（其夫方令正為編劇）選擇澳大利亞為他們的新家。

「家」，一直是 SBS 關注的主題。對澳大利亞移民人口來說，SBS 的服務，是「老家/舊家」與「新家」相遇點，是滿足鄉愁、生根新土的所在。在象徵意義上來說，SBS 的廣播與電視服務，正當化了各種族裔的澳人面孔，給了他們聲音，也給了承認、正當化他們的口音、面貌、膚色、文化的機會與場域。這些澳大利亞新住民與 SBS 的互動交流，正是他們生命情境的寫照。「浮生」一片所描寫的是一個香港家庭的移民經驗，然而在澳大利亞，有無數、各種文化的「浮生」，以各種形式的媒體訴說著自己的故事 (Cunningham & Sinclair, 2000)，而 SBS 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具資源、與最有文化權力的機構。

家的「新」與「舊」，牽引出來的是認同的政治問題、群體之間的互動問題，也因此會帶出「多元文化」的不同定義：此中最常被忽略的是人口佔全國 2%、已在這塊夢土上居住了五萬年的原住民。「多元文化」算誰進來？推誰出去？其實「多元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定義並不明確的概念；不明確的原因在於，「多元文化」的意義隨時在變動，並由社會中的參與者不斷的創造中。也因此，SBS 的產出可以「多元文化」之名為之，批評者可以其它觀點挑戰，這是定義權之間的爭奪。當「多元文化」與「族群」、「多語言」在操作上幾乎等同、同義時，這個概念是穩定與安全的；但當其逐漸擴張定義，界線的畫定勢必造成定義權的衝撞爭奪，界線也就不停地變動。在以上任何一種狀況下，都有

一群原住民是冷眼旁觀的，多元文化的侷限在此出現。該如何邀請他們融入與參與多元文化的定義與活動？這是另一個如何設定政治策略的問題了。

SBS 相當理解自身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公共廣電機構，所面對的機會與限制。多年經營，SBS 已累積了極為豐富的多元文化知識，此為其面對變動的多元文化環境中最為豐富的資產 (Ang et al., 2002: 2)。在 SBS 的成長軌跡中，可以見到 SBS 一步步試探、摸索、定義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的企圖與動作：從早期的「族群廣播電視」到目前定位的「多元文化公共廣電機構」，從早期對觀眾召喚 SBS「把世界帶回家」(bring the world back home)到近日「(你的)世界處處驚奇」(the/ your world is an amazing place)⁽⁵⁾，訴求對象已不只是特定的族群人口，而將所有的澳大利亞人納入：SBS 朝向一個廣義的方向定義自身，並且定義多元文化。

SBS 的改變，或許可以解讀為一個肩負特殊使命的公共廣電機構，在面對變動的社會面貌時，不斷調整改變的各種作法。這個公共廣電機構，最早掌握的文化工具是經由廣播展現了多語能力，連結了主流社會與移民社區。再來是字幕，是澳大利亞觀眾接觸、聯結世界影視文化的介面。近十年來，則是以 SBSi 的產製能力實質鼓勵、具體展現出澳大利亞的影視產製創造力。SBS 除了不斷滿足其所承載的人口社會政策的責任，還在澳大利亞媒體地景 (mediascape) 斧鑿打造出多元文化的風貌。

SBS 的公廣憲章中提到三種對象：族群、原住民、與整體社會；如果將這三個對象看作三個向度，SBS 的作為，就是在此三向度之間調整定位。因此，當 SBS 電視部負責人面對近日批評，說出「十五年前是有一部份人口非常仰賴他們的母語，但今天若還是追隨著彼時標準，無異於等待災難來臨」的話 (Enker, 2004)，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就一個標榜多元文化的公共媒體經營者來說，澳大利亞觀眾已經改變了。如果只有五十歲以上男士對其服務有興趣，而其他年齡層的觀眾都在

流失，策略非調整不可。如果 SBS 所處澳大利亞社會的多元文化圖像已有變化，那是何種變化？SBS 要如何因應調整？

2002 年末，SBS 釋出一份委託學界研究調查的報告 *Living Diversity*，提供了產業資訊以外的重要觀眾訊息。這份深度調查，採集了 1,437 份全國樣本，5 個非英語背景族群社區代表共 2,008 份樣本，6 個原住民社區共 56 份樣本，描繪出多元文化已是澳大利亞日常生活的事實，並且另外的社會事實是，整個社會呈現著一種以正面的方式接納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正朝向成為主流的趨勢發展。僅就媒體使用來說，全國樣本與族群樣本皆顯示了相同水準（64%）近用字幕電影與節目，極高比例每週使用 SBS（全國 65%，非英語人口背景 79%）；非英語族群的樣本社區之間，媒體使用狀況差異極大，某種情況呈顯出社區特色，而某些情況下反而與全國樣本無甚差別；也由於非英語背景族群社區內部的代間差異，NESB 與主流之間的界線有愈顯模糊的趨勢。該份報告特別指出，對 SBS 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有效掌握文化的動態變化，在產出上做出回應，並且針對特定群體的傳播需要，予以滿足。不同群體對於澳大利亞歸屬感及多元文化有高低差異，處理這種差異對 SBS 是一大挑戰。再更進一步來說，報告標舉出應予特別關注的群體，並應進一步利用 SBS 的資源，提供適切的服務：原住民，已在澳大利亞四代以上的澳大利亞人（在研究樣本中這群人反倒呈現出對多元文化漠然的現象），非英語背景年輕族群（通常為移民第二代，表現出對多元文化的信心與樂觀態度）（Ang et al., 2002）。這些建議重點，回應了前述三項 SBS 的潛在危機，也指出了 SBS 的多元文化傳播，在公廣憲章規範之餘，實務行動的可能策略方向。

作為多元文化公共廣電機構，SBS 如何面對潛在危機，持續運用其豐富的文化知識與資源，服務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是關切多元文化實踐及公共廣電發展者觀察留意的重點。而就聯繫族群人口與主流社會、讓澳大利亞社會熟悉世界文化、探索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意義、提供澳大利亞觀眾多元文化服務內容、以及作為澳大利亞內容產出的重要機制等

，都是 SBS 迄今為止不容忽視的成就，值得我國公廣制度發展參考。



註釋

- (1) 非英語人口所使用的語言種類，以使用人口規模大小排列依次為：義大利語、希臘語、粵語、阿拉伯語、越南語、普通話、西班牙語、菲律賓語。此外有相當人口使用的語言還包括了德語、馬其頓語、克羅埃西亞語、波蘭語、土耳其語、塞爾維亞語、以及印度語等。
- (2) <http://www9.sbs.com.au/radio/index.php?page=ds>
- (3) 佔收視觀眾總數比例見 AFC(2004：51)。
- (4) <http://www.sbs.com.au/sbsi/about.html>
- (5) 兩句口號為不同時期的 SBS 形象標語。



智慧藏

參考書目

- AFC (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 (2004). *Australia's audiovisual market: Key statistics on Australia's cinema, video, television and interactive media markets*. Sydney: 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
- Ang, I., Brand, J. E., Noble, G. & Wilding, D. (2002). *Living diversity: Australia's multicultural future*. A research commissioned by SBS.
- ATSIC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 (2000). *Annual report 1999-2000*.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ATSIC. (1999). *Answers to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Brisbane 17 December 1999 regarding the Indigenous Broadcasting Service.
- ATSIC. (1999). *Digital dreaming: A national review of indigenou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Woden: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ATSIC.
- Bostock, L. (1990). *The greater perspective*. Sydney: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 Bowen, M. (1977). Australia 2000: The ethnic impact.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luralism and ethnic groups in Australia*, August 21-25,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Publishing Unit, Armidale.
- Committee of Review of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1985). *Serving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role of broadcasting*.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5). *Population flows: Immigration aspect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Cunningham, S. & Sinclair, J. (Ed.) (2000).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n diasporas*.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4). *Creative nation: Commonwealth cultural polic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Art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DIMA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2001). *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s multicultural policies*. Available: <http://www.immi.gov.au/facts/08multi.htm>
-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DOTAC). (1988). *Review of national broadcasting policy*.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Enker, D. (2004, May 27). Where to now, SBS?. *The Age*, 8.
- Enker, D. (2003, November 10). Stirring the melting pot. *Sydney Morning Herald*, 10.
- ETRP (1980). *Programming for the multicultural television service –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Third Report*.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Gipps, S. (2003). Crunch time over Vietnamese news bulletin. *Sydney Morning Herald*, 7.
- Harris, H. L. (1947). Australians from overseas. In W.D. Borrie (Ed.), *A white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n Publishing.
-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s Australia (ICA). (1999). *A proposal to meet the broadcasting needs of Australia's indigenous peoples*, Submission to the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by the Aboriginal and Torres Islander Commission (ATSIC).
- Jakubowicz, A. & Newell, K. (1995). Which world? whose/who's home?: Special broadcasting in the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 Alphabet. In J. Craik, J. James Bailey & A. Moran (Ed.), *Public voices, private interests: Australia's media policy* (pp.130-146). Sydney: Allen & Unwin.
- Johns, B. (1991). SBS: Coping with a strange idea. In D. Goodman, D. O'Hearn & C. Wallace-Crabbe (Ed.),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challenges of change*, 13-20. Newham: Scribe.
- Kalina, P. (2004, June 24). Movie show drops parental guidance. *The Age*, 16.
- Ketchell, M. (2003, December 20). Behind the Vietnamese siege of SBS.

The Age, 3.

- Kremmer, C. (2003, December 20). Ethnic groups find SBS's sex and soccer a turn-off. *Sydney Morning Herald*, 5.
- Long, M. (2001). *The big issue: The screen industr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ector Crawford Memorial Lecture, SPAA Conference 2001, Melbourne.
- Long, M. (1995). Representing SBS and Australia to the world.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76, pp.18-21.
- Maddox, G. (2004). SBS left reeling as film critics give it the flick. *Sydney Morning Herald*, 3.
- O'Regan, M. (2004). Arguing over SBS. In *The media report*, ABC Radio National. Available:
<http://www.abc.net.au/rn/talks/8.30/mediarpts/stories/s1233894.htm>.
- O'Regan, T. & Cunningham, S. (2000). Marginalised audiences. In G. Turner & S. Cunningham (Ed.), *The Australian TV book* (pp.201-212).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 O'Regan, T. & Kolar-Panov, D. (1993). SBS-TV: A television service. In T. O'Regan, *Australian television culture* (pp.143-168).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 O'Regan, T. & Kolar-Panov, D. (1993). SBS-TV: Symbolic politics and multicultural policy in television provision. In T. O'Regan, *Australian television culture* (pp.121-142).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 Patterson, R. (1992). SBS-TV: Forerunner of the future.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66, 43-52.
- Price, C. (1979). Immigration and ethnic affairs. In A. Patience, *From Whitlam to Fraser* (pp.201-213).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BS (2004). *Annual report 2003-2004*.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SBS (2003a). *Annual report 2002-2003*.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SBS (2003b). Board decision on the Thoi Su news service, *Media Release*,

10.

- SBS. (2002). *Annual report 2001-2002*.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SBS. (2000). *Annual report 1999-2000*.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SBS (1999). *Annual report 1998-1999*.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SBS (1998). *Annual report 1997-1998*.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SBS (1997). *The greater perspective: Protocol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o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unities*. Sydney: SBS.
- SBS (1991). *Annual report 1990-1991*.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Seneviratne, K. (1992). Multicultural television: Going beyond the rhetoric.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66, 53-58.
- Shoebridge, N. (2004). New SBS strategy loses viewers.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52.
- Wilson, H. (1996). ABC & SBS: Networks and nation. In Elizabeth Jacka (Ed.),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ransition: 1986-1995* (pp.42-59).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nd the Australian Key Centre for Cultural and Media Policy.
- Wilton, J. & R. Bosworth (1984). *Old worlds and new Australia: The post-war migrant experience*. Ringwood: Penguin Book Australia.

Multicultural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 An Australian Experience

Vivien Wang*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SB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ustralia's population policy. Through its operation and practices, the SBS has been working to define, fertilise and enrich the no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Initially, the SBS aimed to represent and voice the ethnic groups. Now, it has become the bridge to a wider, different world, which has not been well provided by other electronic media in Australia. All Australians can have access to the service of SBS.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development of SBS. It focuses on the SBS's innovative practice for niche establishment and for its becoming the strategic site of Australian independent filmmaking.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the changing no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may create challenges for the broadcaster to fulfill its Charter responsibilities.

Keywords: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ethnic group,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 indigenous people

*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 Development Department, Public Television Foundation, Taiwan.